



非学无以广才
非志无已成学

郑德荣自选集

郑德荣 著

(上)

吉林人民出版社

郑德荣自选集(上)

郑德荣 著

吉林人民出版社

郑德荣自选集(上、下)

著 者:郑德荣

责任编辑:谷艳秋

封面设计:赵克诚

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发行

(中国·长春市人民大街7548号 邮政编码:130022)

印 刷:北京市江箭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850mm×1168mm 1/32

印 张:21

标准书号:ISBN 7-206-03303-2/Z·154

版 次:2005年7月第2版 印 次:2005年7月第1次印刷

印 数:1 000 册 定 价:52.50 元(共二册)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前 言

我的导师郑德荣教授的宏篇选集现在与读者见面了。这是由吉林省委宣传部和吉林人民出版社遴选出版的著名专家学者仅有的几部文存之一。作为郑教授的博士研究生，我以能够协助先生编辑这部宏篇巨著而深感荣幸。

郑教授 1926 年生于吉林省延吉。早年先后就读于“新京”法政大学、长春大学，1948 年入解放区东北大学、东北师范大学。从 1952 年由该校历史系毕业留校迄今，始终在从事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毛泽东思想等学科的教学、科研工作。1983 年晋升为教授；1986 年被评为博士生导师，是党史专业全国仅有的四个博士点之一的奠基人；1991 年起享受国家特殊津贴。曾担任东北师大副校长等职。现任东北师大政法学院博士生导师、东北师大毛泽东思想研究所所长。学术职务：中国中共党史学会常务理事、毛泽东思想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吉林省社会科学联合会副主席、邓小平理论研究会副会长、中共党史学会名誉会长等。

多年来，郑教授以“理想、勤奋、毅力、进取”的拼搏精神和“严谨、求实、探索、创新”的科学态度，辛勤耕耘在毛泽东思

想、邓小平理论、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以及中国革命若干问题等广阔领域,取得了累累硕果。截止目前,已在《求是》、《中共党史研究》等刊物上发表论文百余篇,出版学术著作 30 余部。展现在读者面前的这部约 50 万字的选集,主要是郑教授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发表的学术论文和著作的一部分。这些论文不仅涉及领域多、各成系列,而且有很多论文因具有填补学术空白和匡正传统学术观点之性质,受到廖盖隆等权威专家的高度评价。这些具有独到见解的系列论文,成为郑教授撰写或主编《中共党史讲义》(上、下)、《中国革命史教科书》、《毛泽东思想史稿》(上、下)、《毛泽东思想概论》、《毛泽东思想论纲》(上、中、下)、《毛泽东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等 30 多部著作的坚实基础。其中,《毛泽东思想史稿》在创立毛泽东思想形成发展体系方面系全国首本,由中共中央办公厅为政治局委员每人配发一部;《毛泽东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该领域首部具有开拓性和重要学术价值的力作。郑教授已有几部著作成为美国国会图书馆和哈佛大学图书馆的藏书,并曾应邀参加国际学术会议。1986 年在美国举办的国际学术会议上演讲,《台湾传记文学》曾对此做了长篇报道。被英国、美国国际传记机构分别选入世界名人传。从“七五”到“八五”,先后主持国家、省部级社科基金项目 7 项,并有相应的学术著作出版。不仅如此,郑教授已为国家培养 14 名硕士、25 名博士(其中有三位增补为博士生导师)等高层次建设人才,并成为教育部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教学大纲和统编教材编写组的负责人、统稿人之一和主编。不难看出,郑教授对繁荣祖国社会科学研究事业和高等教育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作为对成绩的肯定,郑教授先后荣获曾宪梓教师奖(二等)、吉

林省优秀教师、长春市劳动模范、东北师大模范教师以及省部级优秀科研、教学成果奖等诸多奖项和殊荣。尽管郑教授成果卓著，年事已高，但给弟子的印象却总是那么谦虚和不知满足，至今仍然老骥伏枥耕耘在科学园地上，并不断推出新成果。

作为弟子，协助导师编辑选集的过程，也是先于读者领悟先生深邃学术思想的过程。我既为先生的累累硕果和滔滔宏论所折服，亦为先生的缜密思辨和畅快文笔所吸引，更被导师那呕心沥血、孜孜不倦的拼搏精神和严谨求实、探索创新的科学态度所震撼。我深信，广大读者在阅读这部具有传世价值的选集后，定与吾同感。

孙立祥博士

自序

48个春秋,风风雨雨。学海无涯,人生年华有限。以有限的年华,在无涯学海中探索,如果说取得了一些成绩,也只能是沧海一粟。我的学术生涯,是随着共和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挫折而曲折前进的,与其说从大学毕业留校任教开始,不如说十一届三中全会才是真正的开始。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在那“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氛围中,学术思想受到极大的禁锢,虽然发表过十几篇文章,与人合写过册子,在中共中央东北局主持下编写过教材等,在当年还算成果显著,然而如今回首,那是微不足道的。严格说来,还谈不上真正的科学研究。

十一届三中全会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东风吹遍神州大地,随着政治氛围的宽松,我的学术思想迸发出新的生机。抓住有限的年华,拼搏学术海洋。20年间总算创造出应有的业绩,发表论文百余篇,出版著作30部,主持国家和省部级社会科学基金项目7项,获省部级优秀成果奖19项。1978年开始培养硕士研究生,1986年由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评为博士生导师,1987年开始培养博士生,成为全国仅有的几个中共党史博士点的奠基人之一。主持的毛泽东思想研究所1991年在国家教委所属院校147个社会科学研究机构中评比荣获榜首,总分第一。同年享受国家政府津贴。学术职务:中共党史学会常务理事、毛泽东思想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吉林社科界联合会副主席、中共党史学会名誉会长等。

工作需要就是我的志向,做什么爱什么,干什么学什么,个人利益服从党和国家利益是我铭记在心的信条,也是我选择党史和

毛泽东思想作为研究方向的内在动因。80年代初被借调到中央党史研究室工作两年半,这是我学术生涯的重要转机。当时有机会到中央档案馆查阅历史档案资料,这对于从事党史研究工作来说,是多么难得的优越条件。那里保藏着极其珍贵的历史档案,当看到30年代地下党中央的会议记录稿时,我心情十分激动,感慨万分,在那白色恐怖的日子里,坚贞的地下党员用生命和鲜血保藏下来的档案,是何等可贵!对先烈崇敬之情和由衷的责任感无形地激励着我,去深入研究中国近现代历史发展的特殊规律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的丰富经验和沉痛教训,发挥党史研究资政育人的社会功能。这段时间,我如饥似渴、字斟句酌地研读,凡是允许看的,竭尽全力,边阅边思,孜孜不倦,积累了大量第一手的文献资料,为开展学术研究,多出科研成果,发表一批具有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的著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由于潜心研究产生一批新成果,有些是改变学界传统观点或填补空白,有些开拓新领域或提出独到见解,承蒙学界同仁的重视与信任,连续三年被纳入中共党史年刊。80年代到90年代中,多次应邀讲学,先后到过国内15个省市,演讲几十场。1996年应邀出席美国举办的纪念西安事变五十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并在会上演讲,台湾传记文学作报道。1996年应邀访问俄罗斯。

本书在中共吉林省委宣传部领导的提议下编辑而成,所集篇目经我多次筛选,是我20年学术生涯的结晶,是我作为党史研究工作者向社会的回报。全书辑有五方面内容:

毛泽东思想研究。主要是围绕毛泽东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毛泽东思想形成发展的历史轨迹与规律、中国特色革命道路与新民主主义理论三方面问题。

毛泽东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要观点:毛泽东是马克思主

义中国化的伟大旗手和奠基人，是他首先吹响了反对本本主义的号角，并从哲学的高度，为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进而确立了理论联系实际的方针，开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路子。与此同时，在理论实践上实现了马列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历史性飞跃——创立了毛泽东思想。正确的国情观是毛泽东能够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奠基人的一个重要原因，毛泽东思想是他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经过调查研究，树立了正确的国情观的结果。正确认识国情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依据，是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中心环节，是制定路线、方针的基本依据。纵观毛泽东对民主革命时期国情的分析和研究，他阐明了社会性质和历史方位、地理环境与人口状况、悠久的历史与灿烂的文化、生产力状况与落后经济发展的不平衡、阶级结构与社会主要矛盾等问题，其核心是社会性质。

关于毛泽东思想形成与反对教条主义。主要观点：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的真谛在于运用马克思主义，反对教条主义是毛泽东思想形成的一个重要历史特点。这主要是由马克思主义固有属性、特点和中国特色国情所决定的。在此笔者揭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规律性问题。关于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理论笔者认为，“工农武装割据”同“农村包围城市道路”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前者是后者的理论基础和重要组成部分，后者则包括比前者更大的范畴。农村包围城市理论的形成需解决两个观点：一是工作重点放在农村；二是小块红色政权作为夺取全国政权的基地和出发点。因此，不宜以《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中提出的“工农武装割据”作为形成的标志，而《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才标志着形成。强调《反对本本主义》在这一理论形成中的地位和作用。毛泽东农村根据地战略思想，它是武装斗争的依托、实行土地革命的基地、夺取

全国胜利的基地和出发点、形成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雏形。农村根据地战略思想阐明了中国共产党对农村根据地斗争的领导、土地革命是农村根据地斗争的基本内容、中国民主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问题，从而解决了无产阶级领导民主革命的领导权；阐明了武装斗争在农村根据地斗争中的极端重要地位，解决了中国革命主要斗争形式，指明了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具体途径。因此，它在毛泽东思想体系中具有重要地位。

关于中国特色革命道路问题。主要观点：中国特色革命道路并非仅指农村包围城市道路，首先应当是既区别于西方资产阶级革命，又不同于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而是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夺取全国政权，进而经过社会主义改造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分两步走的理论和新民主主义理论，突破了过去只有资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两种革命两种类型国家的传统观念，创造性地提出第三种类型国家的新概念、新学说，从而解决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如何开展共产主义运动，如何走上社会主义道路问题。至于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则是实现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的具体途径，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两者范畴不同。

邓小平理论研究。主要是围绕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邓小平爱国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与毛泽东思想继承与发展关系、邓小平理论对传统社会主义理论的重大突破等四个方面的问题。

关于我国特殊国情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主要观点：首先，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是由昨天国情发展演变而来的。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是由一个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脱胎不久，经过短暂的新民主主义社会过渡而来的。初级阶段社会主义是新民主主义社会发展合乎逻辑的历史必然，是近代中国社会特殊国情、特殊历史规

律发展与作用的结果,两者有着血缘的因果关系,初级阶段蕴涵着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因”。其次,新民主主义社会是过渡性的,而生产的商品化、社会化、工业化和现代化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这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规律。要想在新民主主义过渡时期完成显然是不现实的,况且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后期出现了过急、过快、过粗及所有制单调的偏差,提前跨入社会主义,“两翼”超前,主体滞后,新民主主义社会发展生产力的潜力与优越性没有得到充分发挥,带来历史“后遗症”,势必延续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进程。毛泽东和党中央在较长时间里没能从根本上摆脱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论断,邓小平总结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对我国现阶段基本国情和社会所处的历史方位作出科学的判断,才使人们从传统观念和前苏联模式中解放出来,纠正了长期形成的“左”的思想和超越现实的路线、方针政策,找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最后,阐明依据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基本内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既从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又是把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引向发达社会主义的指路明灯和根本保证。

关于邓小平爱国主义思想。主要观点:爱国主义是民族意志、文化心理、道德风尚、民族气节和政治品格与时代精神的集中体现。国家是一个历史范畴,不同历史时期有不同内容和特点。爱国主义与社会主义是有机统一的,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才能发展中国,现代化是振兴中华的坚实基础与可靠保障。因此文中强调弘扬爱国主义传统必须与实现祖国统一相结合;必须与增强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相结合,必须与捍卫国家的独立完整、维护世界和平相结合。当代,爱国主义集中体现在为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为祖国统一大业和振兴中华贡献全部力量。

关于毛泽东思想与邓小平理论继承和发展的关系。主要观点:毛泽东的社会主义观整体说来是属于科学社会主义的传统模式,既蕴涵着继承发展的熠熠闪光,又夹杂着一些误解马克思个别结论和脱离中国实际的空想因素,但同空想社会主义有着原则区别。其中包含着符合中国实际的有益探索,成为后来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基本实践的起跳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对毛泽东的社会主义观进行合理吸收和科学扬弃的同时,继承毛泽东的社会主义理论的正确思想和他的方法论基础,以崭新的具有质的飞跃的理论内容,突破性地发展了毛泽东思想。其次,继承发展主要表现为:关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关于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阶段、关于生产力标准和经济所有制形式与分配方式、关于经济管理体制、关于改革开放等重大问题。再次,关于毛泽东思想与邓小平理论从宏观上的比较。两者都是马克思主义一脉相承的科学体系,因而有着共同点,从理论来源看,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同属于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产生历史性飞跃的伟大理论成果;两次历史性飞跃都是在坚持从中国实际出发、反对教条主义斗争中形成发展的。两次历史飞跃都是总结实践经验的结果,都是集体智慧的结晶。两次历史性飞跃各有自己的完整体系,具有不同的特点:在理论内容上,两者面临和解决的历史课题不同,侧重点不同;在理论特征上,毛泽东思想传统文化的气息更浓重,邓小平理论的时代特色更鲜明,源于两种理论不同的主体内容,不同的历史环境和创立者不同的文化基础;在理论风格上,毛泽东思想的载体多长篇文章,旁征博引,贯通古今,宏论滔滔,大气磅礴,系统深入,点面结合。邓小平理论的载体多是简短讲话,言语朴实,简明扼要,贴近生活,好懂易记;论证一针见血,切中要害。两者具有逻辑上的因果关系,毛泽

东思想是邓小平理论的思想来源和理论基础,邓小平理论是新时期毛泽东思想发展的新成果。

关于邓小平理论对传统社会主义理论的重大突破。马克思、恩格斯当年所能构想的社会主义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社会调查研究基础上得出的科学结论,因而与现实的社会主义中国形成鲜明的反差,致使社会主义建设遇到困惑,邓小平理论对传统社会主义观的突破,主要是:关于社会主义发展阶段、关于社会主义基本矛盾与发展动力、关于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等重大问题。

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研究。主要围绕共产国际与党内“左”倾错误、共产国际在两次国共合作中的作用、共产国际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三个方面。

关于共产国际与党内“左”倾错误。主要观点:李立三同共产国际不是两条根本对立的路线,且其主体思想来源于国际,两者分歧的内容是城市武装暴动的条件是否具备,暴动时机是否成熟;分歧的性质系属策略性问题。这就改变了传统观点。共产国际与三次“左”倾的关系。中国共产党从1928年11月政治局扩大会议到1931年1月连续犯了三次“左”倾错误,既然前两次都是首先由共产国际纠正的,为何又接下来犯了第三次?笔者依据翔实的文献资料,系统地揭示了共产国际与三次“左”倾的关系,特别是扶植王明掌握中央领导权,以执行国际“进攻路线”。

关于共产国际与再次国共合作的关系。主要观点:从战略上肯定了共产国际推动国共合作的积极作用,同时又指出在处理两党关系和统一战线问题时,在策略上犯有右倾的不可推卸的责任,并深刻分析了右倾的原因。

关于共产国际与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问题。这是中共党史和

毛泽东思想研究领域的一个新的命题。主要观点:共产国际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有双效应,各个时期,在不同问题上应作具体分析。党幼年时期,共产国际帮助指导制定重大政策与策略,列宁关于东方各国共产党要善于把共产主义一般理论与实践用于本国条件的号召,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有重要启蒙作用。列宁民族殖民地理论对制定民主革命纲领和国共合作政策,实际上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大革命失败后,适时地指导中国共产党实行战略转变,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创造了条件。但这一时期的主要倾向是对中国共产党的思想禁锢和组织控制,阻碍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共产国际对遵义会议采取默认的态度,国际七大在一定程度上放松了对各国党的控制,抗战初肯定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并明确表态中国共产党要在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实现全党的团结统一,“王明不要再争了”。这对于稳定毛泽东的领导核心起了重要作用。毛泽东抓住这一有利时机,立即向全党提出“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任务,一改教条主义者的所谓“国际利益是出发点”的做法,而是立足中国实际,正确处理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的关系,全方位地总结中国革命经验,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通过延安整风清算了教条主义为特征的主观主义,树立了理论联系实际的作风。共产国际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反对教条主义虽然持有疑义,然而这时的中国共产党已经成熟,七大终于确立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

中国革命若干问题研究。主要围绕周恩来在“左”倾错误统治时期的历史功绩、红军长征和新的战略基地的确立、西安事变若干问题、日本侵华和抗日战争等问题。

关于周恩来在“左”倾统治时期的历史功绩。主要观点：周恩来秉承共产国际的旨意，及时从莫斯科回国，停止了立三城市武装起义计划，筹备召开六届三中全会，纠正了立三路线，是具有历史功绩的。然而，他却被国际指责为犯了右倾调和主义，蒙受不白之冤。文中揭示了其深层次原因：共产国际贬低、抹煞三中全会的功绩意在为扶植王明取得中央领导地位扫清道路、创造条件。宁都会议是王明为代表的“左”倾中央执行冒险主义军事方针，排斥毛泽东的一次苏区中央局会议。文章以历史文献为依据论证了周恩来虽被重用，但他力主毛泽东不能离开前线，并为此以个人名义向中央提出报告，从而为毛泽东复出创造了条件。

关于红军长征。二万五千里长征是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创造的人间奇迹，经受了三个严峻考验：万里征战破重围——战胜强敌的追堵，经受严酷战争的考验；雪山草地历艰危——征服大自然，经险恶环境的考验；相忍为党申大义——战胜党内军阀主义错误，经受分裂危险的考验。

关于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笔者提出若干新思考：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是由西安、南京和延安三个方面诸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是同事变发动者的初衷和蒋介石的诺言分不开的，在蒋介石同张、杨僵持不下的情况下，中共对和平解决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事变的根本原因是张、杨与蒋介石政见的尖锐对立的总爆发；日本国府不是乘机挑起内战，而是“静观事态发展”；苏联对南京政府既同情又“鸣冤”；“讨伐”决策出自国民党中央，不能简单地说是何应钦不顾蒋介石安危，以期取而代之。

关于日本侵华和抗日战争的历史地位问题。笔者依据翔实文献资料指明了日本军国主义策动“九·一八”事变是在一定背景下推行其既定的“大陆政策”的必然。论述了从“九·一八”到“七七”

日本侵华政策的演变,分析各阶段的特点和原因,深刻揭示了日本军国主义侵华、国民党政府丧权辱国外交、中国人民抗日热潮三方面的关系。文章指出,抗日战争从根本上扭转了中华民族抵御外侮屡遭挫败、备受欺凌的悲惨命运,是中华民族由衰弱到崛起的起点;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武装力量的迅速发展壮大,是民族崛起的强大物质基础,中国人民普遍增强民族意识、爱国主义思想,是民族崛起的精神动力。中国抗战严重地打击和牵制了日军,使苏联避免了两面作战威胁;中国抗战打破了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的时间表,减轻了英美在太平洋和东南亚战场上的军事压力。中国抗战的伟大胜利及其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的重大贡献,使中国的国际地位显著提高。

第五方面多系书序,在此不作介绍。

上述一系列论文的发表,为撰写专著奠定了基础。与此同时,多次应邀讲学,特别是培养博士研究生的需要,促使我博采精研,埋头著述。20年间出版了30部专著,分属于毛泽东思想研究、中共党史研究两大类。《毛泽东思想史稿》两册,1983、1984年由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1991年修订本由中央办公厅为政治局委员配发,是系统研究毛泽东思想的第一部专著,填补了一项空白,具有开拓性。《毛泽东思想论纲》(上中下)147万字,从宏观上将毛泽东思想基本内容分为十五论,分别系统地展开论述,是对毛泽东思想具体内容从体系上全面论述的少有的一部巨著。《毛泽东思想概论》是最早一部创立了概论体系的著作,多次被列为《光明日报》高校征购教材书目。《毛泽东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论》系国家和教委“八五”社科基金规划项目。论述了毛泽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奠基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轨迹与规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集中成果和支柱理论。系统

阐述了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的形成、发展,毛泽东思想体系与邓小平理论的关系以及构成毛泽东思想各基本原理的体系。《中国革命史教科书》系高教出版社出版的专业课用书。

在此落笔之际,对中共吉林省委宣传部和吉林人民出版社以及协助编辑选集的孙立祥博士的大力支持再次表示诚挚的感谢。

郑德荣